

百人百部



雲南文庫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多型论

——民族经济在云南

马丽娟/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多型论

——民族经济在云南

马丽娟/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多型论：民族经济在云南/马丽娟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ISBN 978 - 7 - 5482 - 0923 - 2

I. ①多… II. ①马… III. ①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云南省 IV. ①F127. 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0365 号

责任编辑：石 可

美术编辑：刘 雨 王睿韬

责任印制：张爱成

书 名	多型论 ——民族经济在云南
作 者	马丽娟 著
出 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650091)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电 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0871 - 4113185
网 址	http: //www. ynup. com www. ynp. com. cn
E - mail	market@ynup. com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923 - 2
定 价	46. 00 元

作者小传

马丽娟，女，云南大理人，回族，1963年6月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云南回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女高级知识分子协会副会长。云南省第九届政协委员。昆明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1—2001年，在云南大学学习、工作。其中：（1）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在云南大学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1990年9月至1994年7月，在职学习“中国经济史专业”硕士学位课程；（3）1996年9月至1997年7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4）1998年9月至2001年7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获民族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2001年12月至2012年8月中旬，任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其间：2002年9月至12月任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挂职）。2007年9至12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和人类学系访学。2011、2012年分别到美国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访学1月。

2012年8月下旬至今，任昭通学院院长。

在完成管理工作任务的同时，积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是民族经济、民族教育、回族研究。独立、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重点人文社科基地研究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省教育厅项目10余项；在国家级、省级出版社出版独著、参著著作多部；在国家级、省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云南文库》编辑说明

《云南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编辑出版《云南文库》是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是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是树立云南文化形象、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有共性，还有很强的地域性。一国有一国之学术，一方有一方之学术。学术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虽地处边疆，仍不乏丰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尤其明清以来，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臻密切，省外名宿大儒进入云南的代不乏人，而云南的文人学士也多有游宦中原者。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云南的文化学术遂结出累累硕果，文化名人辈出，如杨慎、李贽、李元阳、师范、王崧、方玉润、许印芳等，其总体集中性的代表成果是《滇系》和《云南备征志》。至清末，云南学子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成为云南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改造社会和推进云南文化学术发展的中坚。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云南的学术成果并未为内地所认知。更有甚者，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在全国征集历代遗书，云南巡抚李右江得到云南先贤的著述，但害怕其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内容，竟私藏起来不上报，使得《四库全书》仅从它处收录了3种云南人著述，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辛亥革命后，云南学人痛感地方文化学术之不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由云龙、周钟岳、李根源、方树梅、秦光玉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云南学者倾力收集整理云南文献，于1914年至1923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初编，共152种1064卷，及不分卷者47册；1923年至1940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二编，共69种133卷。另编定31种待刻，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云南丛书》的编辑刻印工作中止。历时26年编刻的《云南丛书》把保存下来的历代云南重要地方文献网罗殆尽，是云南有史以来地方文化的一次最系统的总结，对云南的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术创新的根基是学术积淀和传承。从编辑刻印《云南丛书》之时

算起至今，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云南的学者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为云南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今天，文化建设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整理和出版云南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是继承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我们才看得更远，走得更实。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云南文库》的初衷。

比之编刻《云南丛书》的时代，云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不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边疆省份，而是成为了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云南的文化创造力也大大发展了，学者力量的壮大、学术成果的丰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云南文库》不可能像当年《云南丛书》一样收录所有的文献资料，只可能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精，尽可能地把最能体现云南学术文化水平和云南学术特色的成果收录进来，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和传承文化，弘扬学术，促进今日云南文化学术的建设与繁荣之目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云南文库》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云南文库·学术大家文丛》，收录云南学术大家的作品。

二是《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出生的云南学术名家的作品。

三是《云南文库·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的优秀作品。

我们将使《云南文库》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不断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云南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云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1年6月

目 录

绪论：再探民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以云南民族经济事实为例 1

第一章 多型的生态环境 20

第一节 多型的自然生态环境 20

第二节 多型的人文生态环境 38

第三节 青铜文明 47

第四节 中国的重商主义源地 55

第五节 回民的外贸传统 62

第二章 多元的经济文化类型 70

第一节 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混合公有制类型 70

第二节 坝区民族的农耕经济 82

第三节 藏民族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 90

第四节 半工半农、亦商亦农的回民经济文化类型 92

第五节 云南民族经济的识别特征 102

第三章 几起云南民族经济史上的大事件分析 107

第一节 大理政权的经济政策 107

第二节 民国初期云南多型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 121

第三节 历史上丽江民族地区的工业合作社运动 129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宁蒗民族地区的生产技能教育 141

第四章 当代云南经济的特点与民族经济	151
第一节 云南经济的基本情况	151
第二节 发展不平衡是目前云南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	160
第三节 “十五”期间云南经济的总体规划简介	164
第四节 多型的民族经济是云南经济的侧翼	171
第五章 发展民族经济是反贫困的第三种战略	189
第一节 云南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	189
第二节 发展民族经济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佳途径	197
第三节 经济环境与民族经济	204
第六章 云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215
第一节 新浪潮与云南民族经济	215
第二节 国外一些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验及其对云南民族 经济的启示	218
第三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云南民族经济	228
第四节 地缘优势与云南民族经济	232
第七章 多型模式共同发展是云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43
第一节 多型云南民族经济的内涵	243
第二节 云南民族经济的发展要点	248
第三节 新时局的牵动 ——对发展云南民族经济的几个具体设想	254
结 语	258
参考文献	259
后 记	262

绪论：再探民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以云南民族经济事实为例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诞生以来^①，通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已形成了一个较为严整的理论框架或体系结构”^②。

民族经济学在其基础理论被创建后，必须经受社会经济现实的检验。因此，需要学者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总结民族经济的“识别特征”，逐渐形成民族经济研究的独特视角及特殊研究方法，凸显民族经济在整个社会发展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与研究状况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能否对应真实的民族经济现象，能否沿着正确的目标前进。同时，它也关系着民族经济是否会在实际的经济发展的中找到相应的位置。

云南以其民族多样性和民族经济多样性的特征，在中国西部地区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而也为民族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经济现象和事例。

笔者身为一个西部边疆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的民族经济学研究人员，由衷地关切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因此，非常希望民族经济学能够成为一种对西部民族经济产生影响、并为西部民族经济的现实发展提供参照的“有用”的学科。故此，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在详细考察云南民族经济事实的基础上，对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再思考。

① 1979年9月，施正一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以《我们需要建立一门新学科——民族经济学》为题发言，第一次提出创建民族经济学这门新学科。《光明日报》于1980年10月24日，以《加强对各民族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为题，摘要发表。

② 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一、对民族经济学研究特点的再思考

一般说来,狭义的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在我国则是研究除汉族以外的各个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笔者以为,单单这么表述是不足以反映民族经济的研究特点的。因为人们很容易从这一表述中得到民族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印象。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作出更为准确的表述。民族经济学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科,它的最突出的特点,不是脱离具体民族就社会和国家范围来研究经济问题,而是围绕着民族因素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来研究各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经济变化与经济关系。^①

民族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区别是由民族经济的特点与一般经济的特点之间的区别来决定的。民族经济和一般经济面对的对象不同、应用的理念不同、解决的问题不同、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但它和一般的经济没有矛盾的地方,它是一般的经济的基础,它和一般的经济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

就民族经济与一般经济的产业结构来看,民族经济是以制造生活必需品和部分生产资料,比如农具、刀具(这在云南是很多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铁器、铜器等等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它以民族传统产业为源头,甚至制造的商品还是民族传统用品的复活,这样就适合于民族经济的以农业为主的小手工业和小加工业的传统结构,而大量的资源开发和生产资料的制造则可能与民族经济相距甚远,在旅游区的民族经济,也可能是以服务为主体的结构,或者是制造旅游品、工艺品。这就是民族经济在产业上和一般经济所占领的领域的不同。在云南的“十五”规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云南将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开辟更多更大的经济区以吸引外资,其产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它的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特征所带来的大工业生产式的管理和经营与民族经济产业的管理和经营有明显的不同。

在资金来源上,民族经济的投资来源更加多样化和小型化。其中以专项

^① 施正一著:《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的民族发展资金为主，以少数民族个人或集体的股份参与为辅，不在投资的规模上对最广泛的各族群众的参与设置障碍，并且把这些投资的风险和收益毫无保留地赋予各族群众自己，让各族群众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让他们成为发展的主导力量。一般经济则更注重大额的外资和风险投资，其投资的风险和受益者可能远在异国他乡，其产品的市场范围也宽广得多。

民族经济以脱贫为最基础的任务，把最大量、最广泛的少数民族群众由“被施救者”变成消费者，并找到一种让他们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确立他们在新时代环境下的“人格地位”。用民族经济的观点来实行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结果就是通过民族经济的特性使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让少数民族群众成为商品经济的主动参与者，通过主动参与，适应商品经济的规则和环境，形成一支新的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的生产人群和消费群体。一般经济发展的目的则是企图改变产业的性质、优化社会的产业结构、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主导产业内形成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

民族经济需要用特殊的方法——以“民族性”为特征的程序来操作。我们将会看到在云南历史上的工业合作社运动、民国初年各县的实业运动和改革开放后的小凉山地区的民族经济振兴运动，这些都是按照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进行的操作程序。一般经济的操作方式是按惯常的、通用的方式来进行的。民族经济如果采用通用的操作方式，就不会得到全面的发展。

我国的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西部各省区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所以，狭义的民族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内的每个少数民族的全部的经济发展问题、一个相对集中的多民族区域里的几个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或是一个局部的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由于云南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民族经济现象极为丰富。因此，云南省具有民族经济学研究极为丰富的田野。

民族经济研究不但要考虑国内少数民族的经济特征及其发展问题，而且还要考虑跨境民族经济发展的问题。就云南而言，在4060公里长的国境线上，有16个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在我国的民族和在他国的同一个民族，或者说具有历史联系和长期交往的几个民族，尽管各民族的国籍不同，但往往

可以有相同和相似的民族经济识别特征，因为就性质上来说，他们都可能属于同一种民族经济形态。

对于国家或省的大的经济发展战略来说，民族经济是一种更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它是一种对各民族的社会基础产生作用的经济结构和行动，是最为广泛的各族群众的经济行动，在这个行动中，各族群众是这种经济的主体，是风险和收益的直接承担者。它的目的不是造就巨富大亨，而是通过具有民族特征的经济实践，使民族地区适应现代的商品经济的环境和节奏，让各族群众成为商品经济环境下的主动参与者，用民族经济的承载物——商品来进行新的社会交融，并形成各民族在这个时代之下的新的生活方式。

因此，民族经济学解决的是比一般经济学更为广泛和普遍的少数民族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发展问题。考察少数民族经济的源流和现状，民族经济学是最为准确和最能切中民族经济本质的一种全新的经济理论。

此外，民族经济学还要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尽量阐明一种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可操作的方法，通过调查、理解、分析、评判提出新的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最平衡和最为全面的发展模式。其目的就是通过学者应用民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民族经济现象的整理和评判，力求对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发展中比较困难的一项——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提示，进而影响社会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关注与支持，同时更希望少数民族能利用这些有关的成果，在经济发展中采取更有利于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从而有利于整体的经济建设。

施正一先生在《浅论民族经济的研究方法问题》一文^①中对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作了非常完整的论述，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这个基础上以系统方法来进行分析和比较的方法论。这一研究方法，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研究民族经济不仅仅要考察民族地区的投资、效益和体制，而且要对少数民族的整个社会形态加以讨论和分析。特别是历史和传统，如历史上的一些有意义的经济事件等等，都是我们对民族经济进行研究的内容。

① 施正一：《浅论民族经济的研究方法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此外，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个案研究方法，社会学、经济学的定量研究等方法都是民族经济学应该借鉴的研究方法。

民族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也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民族经济的研究过程从考察民族开始，至总结民族的经济现象结束（包含提出适合民族经济发展的模式），即通过考察各民族的历史、各民族的经济史，尤其是通过考察民族经济历史上的大事件，整理民族经济现象、识别民族经济特征。

民族间的差异，是由“民族性”造成的。民族性对民族经济是至关重要的，是民族经济研究的着眼点，形成民族性的因素是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心理、社会形态、价值取向和物质环境。所以，在讨论民族经济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些民族性对于经济的影响。

各民族的经济特征和民族的其他特性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不同的民族经济对不同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起到了各种不同的作用，无疑，它还会对民族的将来起作用。

在对云南的民族经济的历史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和分析时，我们发现云南的民族经济在历史上是一种真实性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一种需要人为来强行划分和归类的纯粹在概念和名称上的思辨游戏。并且，在云南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上，已经形成了民族经济的现实的特殊性，我们不能说这些特殊性都是整个经济意义上的瑰宝，但是它适合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起码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

在云南这样的现实环境之下，比如：刀耕火种可能是比较适合自然环境的一种选择而不是这个民族落后的表现；在与世隔绝的大峡谷中，农耕经济长期以土地和分配公有制的形态出现并非就是社会发展阶段的止步不前；即使是在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坝区，比如傣族的某些农业经济区，20世纪50年代尚处于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形态，这也不能说明傣族的社会发展就十分落后，如此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用民族经济学的眼光来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界定，并且指出这些特殊性对于我们现在发展云南民族经济的意义所在。

在民族经济学的视野里，恰恰是这些特殊性使这一理论凸现出民族经济

学的价值。这些特殊性是构成云南民族经济识别系统的明确符号。对于这些符号的整理和分析,是丰富民族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理论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民族经济的二重性和多样性特征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

民族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二重性,即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融合为一体,“它不能离开民族,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它也不能离开经济,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它是民族与经济这两个要素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具特殊构造的新的有机现象”^①。“任何民族都有自己内部的经济联系或共同经济生活,而同时不同民族之间又相互发生经济交往。民族内部与民族外部的这种经济联系或交往关系,不仅是产生民族经济的基础,而且也是所有民族生存、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基础。”^②

正是因为民族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的融合和相互作用,因此,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视点,就是要着重于这两个因素之间的“作用”的分析。“作用”是有机的和动态的,民族经济是民族性的经济表达方式,民族性是民族经济内在的精神内核,它是民族与经济这两个要素在互动的作用中产生的。

“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是一种辩证关系,在民族经济研究中,不能把这两个因素割裂开来,而应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恰当地处理民族经济在理论上的合理地位和研究角度,那么,研究的方向就会发生偏差。

在多民族地区,或者说民族特性明显的地区,比如云南的广大民族地区,民族经济的根本标识,就是它的多样性,这是由这些地区的历史传承、自然环境、生存条件以及各民族人民的价值取向、经验传统、文化特征所决定的。民族经济的活力和内禀原则,就体现在多样性之中,可以说,在多民族地区,多样性是现实的和有益的,忽视多样性就无法认识民族经济的根本特性,同时也就无从对民族经济有所裨益。

① 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② 同上。

这就是多民族经济发展和其他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因为民族经济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在民族地区遇到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对于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输血和造血的问题、人力资源的流动问题、劳动力素质和日益增长的科技之间的差距问题、中央和地方利益的问题、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发展经济和发展科学文化的问题，等等。

在民族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每一种民族经济都是具有“他自己”的特征的经济。同是在民族经济的范畴内，具体的、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现象却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和区域有关，更和民族的整体特性有关。

民族经济的现象是由民族群体来体现的，各群体的行为，具体地说，经济行为是多样化的，正是这种多样化构成了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可以说，“多样性”和“多型性”就是民族经济的一般特征。

民族经济学十分珍视民族经济的多样性，认为必须保护和坚持这种多样性的民族经济发展道路，让各民族自己在主体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成为他们自己经济的发展主体。这样，各民族人民就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完全地融合在这个经济范式中，并为它的发展尽心竭力，而不是作为一种附庸的、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多样性民族经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一个经济主体的问题，这就要求社会给予民族经济更特殊的政策和灵活的规范，在民族经济的多样性的实践之初，这个问题就更显重要。

三、民族经济的价值判断问题

在以往的“主流”意识中，往往把云南民族经济文化现象简单化和虚无化，用“落后、怪异”这样的词汇来定性云南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思想不胜枚举，即使是用赞叹的态度来论及云南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言论，也多多少少把它等同于奇风异俗和可以赏玩的一种表演。可以这样说，在直至目前的云南民族经济文化的研究中，还少有认真地甚至是“正经”地把它作为一种可供我们借鉴的、平等的、同样属于中华民族珍贵遗产的一部分来确认的意识和方法。因此，要心平气和地、甚至怀有敬意地来探究云南民族经济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质疑中心论。

中心论是某些学者在研究云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时，表现出来的一

种以中原经济文化类型为参照坐标的思想。它是一种受“中心”摆布或者说以“中心”标准为标准的观点。它表现为：一方面用中原的经济文化类型来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作一种蕴涵着排斥性的对比；另一方面则认为在民族经济文化的成果上也主要是由于受到“主流”的影响；对于当代来说，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要受“中心地区”的发展模式的规范，如果说民族地区要发展经济的话，那么民族地区用不着总结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只要尽可能地向“中心”地区看齐就行了。

中心论妨碍了我们以一种正确的态度来研究云南民族经济文化类型，至少它会给人们一种印象，就是认为云南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是无足轻重的，是可要可不要的和仅有一种欣赏价值的东西，它能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奇装异服、歌舞表演，顶多是旅游观光时的一种余兴节目或者只是一个浪漫故事的题材，云南民族经济文化的价值未必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借鉴作用，而云南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必过多地去理会这些陈年旧事。这样的结果是漠视了云南各民族人民在非常独特的物质环境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明成果，无论如何，这种思路对云南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民族经济学则不持这样的观点，民族经济学认为，民族经济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就存在着，并且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它自己独特的作用。民族经济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它的性质和特征是民族的印记，最主要的一点是，民族经济就是以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经济，由民族自己来承担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和进程，各民族自己是这种经济的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并以他自己的传统和个性来塑造这些经济的识别特征。

历史不是循环的，然而也非跳跃的，一种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在云南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地区，不可能完全脱离开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个性来打量今日的经济文化发展。然而，遗憾的是这一点却没有成为人们的共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问题是从属于阶级的问题。他们指出：“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从而揭示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

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民族问题的实质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也说明民族问题得用阶级的眼光来看待，特别是当我们在研究错综复杂的民族现象时，如果没有这个指针，就会被偏颇的观点所局限。封建政权对于其他民族的统治，就总是为了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来行动的。或者说，甚至是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的一种个人野心和欲望在起作用。榨取、掠夺，就是“文治武功”的终极目的。在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上，也不例外。

因此，在讨论云南民族经济的历史时，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云南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是云南各民族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在很多学者的论述中，都强调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云南的“开发”，并把这种“开发”作为云南历史上的大事来看待，颇有点“皇帝不来滇，万古如长夜”的意思。

但我们认为，要把历史上中原、滇、巴蜀、荆楚、百越、吐蕃等等各地各族人民平等的自由往来而造就的民族大融合和封建朝廷的“文治武功”分开来。事实上，封建王朝的“经略”往往倒是造成民族隔阂和经济文化倒退的一大原因。如云南青铜文化的衰落就是例证。这个灿烂的文化在东汉时无可奈何地陨没了，时间正好是汉朝在云南建立了封建统治之后不久。在清末云南发生的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也不难发现这是封建朝廷为了转移阶级矛盾而挑起的。当然，这些行动，客观上有促进各民族交往和相互学习、相互认同的作用。但人民之间的互动，是违背封建统治者的意愿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民族团结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民族经济问题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树立这样一种民族观：各民族的发展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有可继承的传统，就各民族而言，没有哪一个民族是处于“中心”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经济是不行的”。^①周恩来同志也强调：“帮助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各民族能够逐步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4页。